

导 语

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对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重大问题过程中得到验证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既可以从中国革命史、改革史和建设史的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进程，也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交互

作用中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普遍原理个性化的问题。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与理论的双重需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需要联系、结合各国实际来加以解释和应用，只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中国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只有在上升到理论的规律性的层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着理论与实践、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因为共性来源于个性，共性要还原为个性来实现，否则，共性就是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如果不同各国实际相结合，就会成为抽象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原则。理论要联系实际，实践要理论为指导，不讲理论或不联系实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方面即纵向方面是与时俱进，根据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不同时代的特点、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在空间方面即横向方面是因地制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列宁也指出：“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的问题，总结和概括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揭示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语言变成中国的民族语言，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初是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足点的科学定位，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后，并未被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所肯定。20世纪40年代，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断言，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于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革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第37页。

命的理论指南，不受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限制，不存在因国家和民族的区别而国家化民族化的问题，不存在因为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进行必要的修正和创造新的观点问题。因此，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科学，甚至迫使毛泽东改变提法，以此来限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出于尊重斯大林和苏共的考虑，毛泽东在苏联人帮助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提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说法不能完全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的深刻的政治内容。后来，毛泽东实际上仍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必要性^①。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结合”过程包含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化三个层面^②。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即要在中国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历史进程。无论成功与失败，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是否坚持了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不

^①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29—433 页。

^② 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学习马克思主义，谈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教条式照搬马克思主义，误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和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社会理想等四个方面是相通的^①。有的学者则认为，人本性、理想性、实践性、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相容之处^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也没有出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一要区别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个别结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同国家的个别结论；二要处理好文化内容与形式关系，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与中国文化结合，赋予中国文化的形式；三要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不能僵化地传播，而要发展地传播。

自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

张岱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3期。

邵汉明：《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新长征》1999年第4期。

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的。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世界上只有苏联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用俄共的标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当然要严重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我们党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盲从苏共和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在马列主义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是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在农村这一薄弱环节首先突破，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重大问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国情的特殊复杂，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怎样才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理解上的多样性；但有一点是可以形成共识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曾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毛泽东后来说过，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少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邓小平1956年在《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指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离开任何一面都不行。他强调：“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①但遗憾的是后来发生了失误，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出现了偏差，未能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不发达的基本国情，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盲目求快、盲目求纯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等超越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飞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②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结果。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合，走自己的路。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和运用不应是教条式和机械式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

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创新和发展，而不能搞教条主义的照搬。

从形式上看，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事实上不够完善的社会主义；既以公有制为主体，又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现实国情实际出发提出的新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是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范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

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历史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党从成立起就开始了把马克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20 页。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难探索，在经历了挫折与成功后，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的认识才逐步达到了自觉成熟的阶段。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革命、改革和建设三次伟大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反过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意义上的“化”，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的“结合”，是一般与个别相统一之上的“飞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根本标志。换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本质内涵和最高境界。从实践与理论的双重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有一个出发点问题，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而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甚至把俄国式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或者照抄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革命经验，表面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实际上

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并未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真正结合，并未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要理论联系国情实际，而不能用理论剪裁实际，不能要求实际去适应理论，这是唯物主义原则的贯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重大贡献是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发点上的错误，既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更是把中国实际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求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揭示和科学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有一个立足点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要解决中国社会不同时代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接纳、吸收的过程，是中西文化双向选择中相结合的过程。中国本土文化的变化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方向，中国本土文化又在吸收马克思主义以滋养自己；中国文化并未变成西方文化，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反而深刻地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而逐渐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受惠于外来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得到了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传入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

最高概括。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原因，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项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①。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重要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和最明确的阐述。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不能是表面的、片面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而要解决深层次重大基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主要是民族独立和国强民富两大问题，实现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这就产生了革命、改革和发展三大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这三大主题。换句话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解决了这三大问题，才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分析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有一个着力点问题，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

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动地与中国实际结合；没有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的问题，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发展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6页。

和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胜利的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独立、富强的关键。

坚持、改善党的领导，核心的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建立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这样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要与时俱进，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学说，邓小平回答了制度建党问题，江泽民、胡锦涛党建思想解决的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党的领导和建设学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就是在不同历史时代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标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都是在实践与理论双重探索中形成和发展的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成果是“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水平。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 80 多年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六大和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展到新阶段。

第一节 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本质和实践性品格所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和革命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本质与实践品格

19 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批判地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而

又超越前人，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就其本质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实践性与创新性融为一体的科学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对客观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揭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各国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用世界眼光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特点趋势，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特殊运动规律，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服务，是无产阶级立场在理论上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经济根源，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指导无产阶级经过曲折奋斗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严整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本质，反映了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性，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提供了科学指南。《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多年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普遍真理，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是相统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马克思依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总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进程。但当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时，马克思立即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就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②。由于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具有各国的特殊性，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研究全球化条件下不发达国家的国情实际时，提出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代替论”和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跨越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2—74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1—342 页。

体现的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革命规律之间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科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高度理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既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又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离开实践这块沃土，马克思主义之花就将枯萎；脱离具体的实践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是万能的教义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能直接提供解决各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现成答案，而只能提供无产阶级在具体的实践中认识世界、掌握规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源于无产阶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回到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才能在指导革命中得到验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创新的理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只有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巨大的思想威力。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由于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因此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①。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和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2 页。

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和实践性，密切关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深入总结和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补充进新的内涵而获得新的活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列宁主义阶段。列宁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转变为革命实践的时代，认识到只要各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要求消除多样性，所以他要求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要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才能发挥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才能通过解决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的实际问题来实现其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

二、中国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变迁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本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为什么能在东方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基督教等西方文化未能在中国文化土壤扎根与结果，而马克思主义却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不少学者从文化层次上对此作出诠释，有的认为 16 世纪至 19 世纪中西文化的大际遇，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着学脉渊承的关系；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有一些相似相通的因素^①；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① 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9 页。

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

页。